

从空间流动到心理融入:户籍身份与 城市居民归属感

——来自CGSS2023的经验证据

侯 力 郑峥嵘

摘要:以人为核心的城乡融合发展不仅体现为流动人口在经济层面的融入,更强调其在社会交往、身份认同与心理归属等层面的深度融合。户籍身份作为影响人口流动与城市融入的重要制度因素,可能持续塑造城市居民的归属感。实证分析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3年数据,通过构建城市居民归属感综合指数,系统识别户籍身份对归属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非本地户籍身份显著降低城市居民的归属感,且这一影响主要通过社会性隔离发挥作用,即户籍身份差异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社会交往与社会联结,进而削弱个体对城市的认同与心理归属。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显示,户籍身份的负向影响在低收入群体、男性、无固定房产群体、受教育年限为9—12年群体以及原本具有较高归属感的居民中更为突出。同时,户籍身份对归属感的影响呈现明显的空间、身份与代际差异,跨县农业户籍人口和第二代移民的归属感相对较低。居留时长的增加能够在总体上促进归属感提升,但尚不足以弥合第二代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归属差距。上述结果表明,推动城乡融合需要突破单纯依赖户籍制度放宽的政策思路,更加重视流动人口在公共服务获取、社会交往机会和城市身份认同等方面的实际需求,通过增强社会联结、改善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和提升城市包容性等方式,促进流动人口由“居住融入”向“心理融入”转变。

关键词:城乡融合发展; 户籍身份; 城市居民; 归属感; 空间流动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6.05.008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宏观战略下,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跨区域流动人口在城市就业和生活,其中部分群体受户籍身份、公共服务可及性及社会融入程度等因素影响,仍面临市民化不充分的问题。截至2023年底,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8.3%^①,而2025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7.9%^②,两者之间的差距反映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半城市化”的问题。面对这一现实挑战,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从早期侧重于空间集聚与产业转型,逐步演进至以人为核心、注重公民权益保障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协同推进的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旨在加速推动从“流动中国”走向社会心理与权利认同高度契合的“融合中国”。当前,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正从追求“量”的扩张转向实现“质”的跃升。这一跃升过程的成败,关键在于能否化解上述难题,推动流动人口从经济立足、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十四五”重大课题“国际秩序大变革背景下的中国东北亚区域合作战略研究”(22JJD790095)。

作者简介:侯力,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春 130012; houli@jlu.edu.cn);郑峥嵘(通讯作者),吉林大学东北亚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春 130012; zhengzr24@mails.jlu.edu.cn)。

①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城镇户籍人口数/户籍总人口数)×100%,主要反映制度上的市民化程度。参见《公安部:2023年底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8.3%》, <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405/27/WS66541261a3109f7860ddf8b5.html>, 访问日期:2025年5月27日。

②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地区全部常住人口,主要反映人口在城镇的聚集程度。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602/t20260228_1962662.html, 访问日期:2026年2月28日。

社会嵌入到心理认同的深度融入。过去,从单一的经济维度来看,户籍身份的转变被视为打破城乡收入壁垒的关键一步。然而,在当前户籍政策大幅放开的背景下,非本地户籍居民选择不落户往往不是不愿融入,而是在土地制度、教育制度、集体权益等多重制度约束下的理性权衡。从更深层次来看,随着常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的推行,户籍准入要求正逐步降低,但城市空间内部的资源分布并未自动实现均等化。这也意味着,单纯的身份转变已不足以保障权益的获取,身处何处,对于个体社会权利的获取至关重要。

现有研究发现,获得城市户口能够显著改善劳动力群体就业质量^①、提高个体收入^②并释放消费潜力^③。从社会发展维度来看,户籍壁垒的降低不仅实现了医疗^④、社保^⑤等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更增加了流动人口子女获取优质教育的机会^⑥,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奠定基础。这种因身份转换而产生的资源获取,被视为促进社会纵向流动^⑦、实现阶层跨越^⑧的重要机制。从行为发展维度来看,城市户籍显著提高了流动人口在常住地购买自有住房的可能性,促使其从流动走向定居^⑨。在社区参与层面,户籍身份的稳定也增强了他们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意愿^⑩,加速了其生活方式的城市化进程。然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及其附着的福利差异^⑪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居民平等享有公共服务的社会权利^⑫,导致“半城市化”现象的产生。近年来,空间社会学理论为城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空间不仅是社会生活的容器,更是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产物^⑬,户籍制度正是通过空间区隔来生产社会不平等的关键机制。

然而,现有研究对户籍身份影响心理融入的深层机制剖析不足,既缺乏对社会性隔离等路径的实证检验,也忽视了不同户籍群体的异质性。当“他乡”在物理上成为城市居民工作与生活的常态空间时,一个亟待厘清的核心议题便随之显现:户籍制度作为我国人口管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否会穿透客观现实的层面,在无形中划分着“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心理界限,深刻影响城市居民的主观归属感?这些研究缺口为本文的深化探索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本文旨在从多维度系统探究非本地户籍身份对城市居民归属感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将检验社会性隔离的中介作用,揭示户籍身份影响心理融入的内在路径;考察户籍梯度与生命历程对于户籍身份影响归属感的边界条件。相比于现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1)引入空间社会学视角,将户籍身份、地方空间与社会权利获得紧密结合,进一步说明即便在户籍开放的背景下,身处何地依然深刻制约着流动人口的社会权利与

① 魏东霞、陆铭:《早进城的回报:农村移民的城市经历和就业表现》,《经济研究》2021年第12期。

② 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许敏波、鄢姣:《户籍工资差距中歧视的形成路径——基于城市偏向的劳动力市场搜寻分析》,《北京社会科学》2024年第12期。

③ 王乙杰、孙文凯:《户口改变对流动人口家庭消费的影响——来自微观追踪数据的证据》,《劳动经济研究》2020年第2期;田素华、赵永哈:《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上海经济研究》2024年第5期。

④ 张蕾、胡星:《阶层跨越能够改善老年人的主观健康水平吗?——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微观证据》,《人口学刊》2023年第4期。

⑤ 温兴祥、郑凯:《户籍身份转换如何影响农村移民的主观福利——基于CLDS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财经研究》2019年第5期。

⑥ 李尧:《子女异地升学限制对流动人口家庭迁移模式的影响》,《世界经济》2025年第11期。

⑦ 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

⑧ 张蕾、胡星:《阶层跨越能够改善老年人的主观健康水平吗?——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微观证据》,《人口学刊》2023年第4期。

⑨ 刘媛、熊柴、蔡继明:《农民工进城落户的意愿为什么不高?——基于可解释机器学习方法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25年第4期。

⑩ 李晓光、李黎明:《制度分割、志愿者行动与公共性再生》,《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⑪ 吴晓刚、张卓妮:《户口、职业隔离与中国城镇的收入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⑫ 高飞:《跨地流动与属地管理新制度主义下流动人口治理悖论》,《农业经济问题》2025年第1期。

⑬ 林聚任、刘佳:《空间不平等与城乡融合发展:一个空间社会学分析框架》,《江海学刊》2021年第2期。

心理归属,深化了对“半城市化”现象背后空间机制的理解;(2)将户籍身份的影响从制度排斥的宏观叙事下沉至心理成本的微观机制,深化了对制度排斥心理后果的理解;(3)通过多维度机制效应的整合分析,揭示了户籍身份影响归属感的内在机制与边界条件,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高质量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户籍身份对城市居民归属感的影响分析

户籍制度的基础功能,是人口登记与住户识别。然而,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户籍制度被附加了社会福利与资源分配等诸多功能。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就是使附加功能与户籍身份解绑,从而恢复其人口登记的基础功能。尽管近年来户籍制度改革持续推进,但其与部分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资源之间的关联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关研究表明,不同户籍身份的城市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获取条件和便利程度方面,可能存在一定差异^①。社会福利制度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也可能产生一定的群体分化效应^②,使部分非本地户籍居民在城市生活中面临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入方面的现实压力。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非本地户籍身份对城市居民归属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传统上,户籍制度通过划定本地与外地的身份边界,决定了个体在城市空间中的位置与流动自由。随着常住地公共服务制度的推进,这一身份边界的刚性正在弱化,但其历史惯性仍在深刻影响着城市居民的心理融入。在户籍制度改革与城乡融合发展相关政策推动下,除少数超大特大城市外,绝大部分城市已基本放开落户限制。这一政策背景也意味着,流动人口选择不落户,往往是在土地制度、教育制度、农村集体权益等多重制度约束下的理性选择。社会排斥理论认为,个体的贫困与孤立不仅源于经济因素,更源于其社会关系中的边缘地位^③。在社区环境中,当个体遇到困难时,充分的社会支持能够提升其对社区的安全感和依赖感^④。在日常互动与生活中,个体与周围人之间频繁、低强度的互动,是建立最基本社会网络的基础^⑤。普遍而言,居民的原生社会网络是基于地缘、血缘、学缘长期积累而成的^⑥。拥有本地户籍的居民,其邻居可能是发小、同学、亲戚等熟悉度更高的群体,彼此之间的信任和互动是天然存在的。然而,部分非本地原生居民在实现居住地转移后,在构建本地社会网络时,往往需要从零开始。这个过程需要大量时间、精力和情感投入,对于为了生计奔波的个体而言成本极高。这些难以避免的社会现实差异,可能加剧本地居民的排外心理,拥有本地户籍的群体在潜意识中可能不愿对陌生身份的居民投入过多情感以实现深入交往。这种不稳定性预期也会阻碍信任的深化,产生社会性隔离。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a:社会性隔离在户籍身份影响归属感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非本地户籍身份会削弱城市居民在本地社区的邻里网络规模和社会支持水平,间接降低其归属感。

(二)多维度群体特征分析

户籍身份并非单纯的同质化制度限制,在不同群体内部,其对居民归属感的负面影响可能存在巨

① 程名望、李代悦、杨未然:《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中存在“户籍歧视”吗?》,《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② Esping-Andersen G.,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③ Townsend P.,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Survey of Household Resources and Standards of Liv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p. 304-336.

④ Trombini C., Jiang W., Kinias Z., “Receiving Social Support Motivates Long-term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25, 197(4), pp. 689-711.

⑤ 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8(6), pp. 1360-1380.

⑥ 孙文中:《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民工的创业型社会融入》,《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大差异。跨县流动不仅是地理位置的迁移,更是一次本地公民权的重新申请,其制度性摩擦远大于在同一行政区内的身份转换。在空间层面,县界分割了完整的社会空间。县级行政区划不仅是地理边界,更是被行政权力、社会关系和文化认同共同塑造的有机整体,它分割了劳动力市场、教育体系和社会网络。跨县流动意味着个体必须脱离原有的社会空间,进入一个全新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自身归属感。在社会网络层面,跨县流动导致支持系统硬着陆。县内流动的个体,其以血缘和地缘为核心的强关系网络并未完全断裂,仍能提供有效的情感与工具性支持^①。而跨县流动往往导致社会网络资本的断裂,个体被迫在陌生环境中依赖弱关系重建信任与支持系统,成本极高,这直接导致其社会性隔离和归属感缺失^②。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2:户籍身份对居民归属感的负面影响存在梯度效应,其核心在于跨县流动带来的地缘壁垒。

户籍身份对归属感的影响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符号互动论强调人类对事物的行动是基于事物对他们所具有的意义。在市民化进程中,获得户口通常被视为获得了本地人的“符号”,这个符号会改变个体的自我认知以及与他人的互动方式^③,为其心理融入奠定基础。但在不同群体中,符号的价值也存在显著差异。对于那些在本地完成身份转换的本地新市民而言,这一身份符号的主观意义可能强于本地原市民。由于该群体未经历跨区域地理迁移,其社会网络与文化背景具有延续性,户籍的获得被视为纯粹的身份升级。同时,为了补偿自己在落户过程中付出的时间、金钱、精力等成本,新市民会产生强烈的动机去强化对这个城市的正面评价和归属感,以接受自己在实现这一转变过程中付出的沉没成本,从而缓解“我付出了这么多,但这里可能不值得”的认知失调^④。这种珍视效应和合理化效应共同导致其归属感水平的超额补偿,进而带来了本地新市民红利。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3:户籍身份对归属感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成功落户是外来者实现心理融入的转折点,而户籍身份的转变则给本地农转居的新市民群体带来了红利。

(三)生命历程视角下户籍影响的动态演变

户籍制度对不同代际移民的身份认同构成了深刻且持久的挑战。生命历程理论强调,个体在特定生命阶段的经历会对其一生产生深远影响^⑤,而移民融入又是一个需要经历文化适应、结构同化、婚姻融合等多个阶段的线性过程^⑥。具体而言,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说,在他们迁入城市前,其核心人格和身份认同已在乡土社会中基本形成。他们拥有清晰的参照群体,其身份认同的深层根基也能保留在乡土之间。即便面临制度性排斥,第一代移民仍可通过落叶归根的预期来维持心理平衡,其归属感的缺失更多体现为工具性层面的不满,而非身份认同的彻底动摇。相比之下,对于第二代移民来说,生命历程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整个社会化过程都嵌入在户籍制度的排斥性结构之中。他们在城市出生、成长,其童年、青少年时期恰恰是身份认同形成的关键阶段。在城市中、在反复经历户籍制度排斥的过程中,这些经历被内化为自我认知的一部分,形成了一种难以逆转的低归属感状态。更为关键的是,第二代移民与第一代移民赖以生存的乡土社会早已失去密切联系,个人能动性受限与社会结构发展约束的双重困境,导致他们既无法认同父辈的乡土文化,也无法被城市主流制度所接纳^⑦。事实上,两代移民均处于户籍制度的刚性结构中,且第一代面临的早期排斥环境可能更为严苛,但户籍制

① Giulietti C., Wahba J., Zenou Y., “Strong Versus Weak Ties in Migrat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8, 104, pp. 111-137; 刘启超、王亚华:《城市规模、社会网络与农民工的工作搜寻》,《财贸经济》2023年第3期。

② 郭晓欣、钟世虎、李子健:《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化的影响机制——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发现》,《中国人口科学》2023年第4期。

③ Blumer H.,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9, p. 8.

④ Miller M. K., Clark J. D., Jehle A.,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Festinger)”, in Ritzer G. (ed.),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2017, pp. 543-549.

⑤ Elder G. H., Jr., “The Life Course as Developmental Theory”, *Child Development*, 1998, 69(1), pp. 1-12.

⑥ Gordon M. M.,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238.

⑦ Park R. E.,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28, 33(6), pp. 881-893.

度对其归属感的边际影响却存在结构性差异。参照群体理论指出,个体的满意度与归属感不取决于绝对状况,而取决于与参照群体的相对状况^①。当个体感知到自身实际状况与期望状况之间存在不可弥合的差距时,会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这种相对剥夺感会侵蚀个体对所在社会的认同与归属^②。对第一代移民而言,其参照群体主要是家乡同乡,期望值较低,户籍制度的排斥相较于其进城前的状态仍属于一种相对获得,因此其相对剥夺感较弱,而对第二代移民而言,其参照群体已转变为本地城市同龄人,期望值较高,户籍制度的排斥则构成了相较于本地同龄人的剥夺性损失,相对剥夺感更强。因此,第二代移民的归属感危机,并非简单的适应问题,而是由户籍制度这一刚性结构所导致的、在其生命历程早期便已固化的身份困境,这种制度性壁垒带来的心理影响,或许无法仅依靠时间的流逝来完全消解。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4:移民的城市融入过程具有一定的代际分化趋势。第二代移民面临着持续的归属感危机,且居留时长的增加无法有效弥合这种代际鸿沟。

二、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2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GSS),问卷内容涵盖了社会、经济、行为、态度等多个维度。本文关注城市居民的归属感问题,因此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如下筛选:(1)剔除居住在农村地区的样本,即根据受访者居住地类型,仅保留居住在城市中心、城市边缘及城镇的相关样本;(2)剔除相关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经过上述筛选,最终获得有效样本2284个,描述性统计参见表1。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归属感	2284	-0.01	1.00	-4.84	1.86
核心解释变量	户籍身份	2284	0.42	0.49	0.00	1.00
控制变量	性别	2284	0.61	0.49	0.00	1.00
	民族	2284	0.95	0.22	0.00	1.00
	婚姻状况	2284	3.40	1.67	1.00	7.00
	政治面貌	2284	1.51	1.08	1.00	4.00
	受教育年限	2284	10.94	4.12	0.00	19.00
	自评健康状况	2284	3.53	1.01	1.00	5.00
	自评社会地位	2284	4.51	1.78	1.00	10.00
	家庭规模	2284	2.78	1.61	1.00	15.00

(二)变量选取^③

1. 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的被解释变量为归属感(*Belonging_score*),聚焦于个体在城市日常生活中的微观社会融入体验。社区作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最直接的空间载体,是个体与城市社会建立联结的基础场域,邻里互动构成个体嵌入城市社会网络的第一层次,社区层面的交往广度、情感信任

① Merton R. K.,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Toward the Codification of Theory and Research*,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49, p. 423.

② Runciman W. G.,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A Study of Attitudes to Social Ineq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6, pp. 1-338.

③ 限于篇幅,本文相关变量的测度方法未在文中呈现,如有兴趣可联系作者索取。

与互助预期,反映了个体在城市中最基础的社会融入状态,是更高层次城市认同的微观基石^①。因此,本文从行为互动、情感联结与预期功能三个维度对归属感进行测度^②。最后,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降维,提取公因子并计算因子得分,作为归属感的综合得分。

2.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选取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户籍身份(*Hukou_nonlocal*)。在本文中,构建二元虚拟变量,将户口登记地为本乡(镇、街道)的本地居民设为具有本地户籍的基准组,赋值为0;样本范围内其余居民设为具有非本地户籍的处理组,赋值为1。

3. 控制变量。为缓解遗漏变量偏误,提升模型有效性,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性别、民族、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受教育年限、自评健康状况、自评社会地位和家庭规模。

4. 其他变量。一是中介变量。为探究户籍身份影响归属感的内在机制,本文从社会性隔离视角出发,选取两个指标分别反映个体在城市中的社会网络状况。具体包括:(1)社会网络规模,反映社交接触的广度;(2)社会网络支持,反映实际支持的可及性。

二是户籍与身份的梯度变量。前文将户籍登记地不在本乡(镇、街道)的样本界定为“非本地户籍”,以考察户籍排斥的整体效应。为了进一步考察户籍身份影响的空间梯度效应,更好地区分“本县内跨乡镇流动”与“跨县流动”两种不同的流动类型,检验户籍身份的负面影响是否随流动距离增加而增强,本文在进一步分析中对“非本地”样本进行细分,结合户口登记地和户口性质信息,构建了户籍梯度变量与市民身份类型变量。其中,户籍梯度变量综合了户口登记地和户口性质信息,将样本划分为本地户籍、本县内农业户口、本县内非农户口、跨县农业户口、跨县非农户口五类。该变量能够同时捕捉地理空间与身份属性两个维度的信息。市民身份类型则反映不同群体的身份特征,包括本地原市民、本地新市民、外来落户市民以及外来非落户市民。该分类体系既体现了户籍制度的历史遗留影响,也反映了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身份分化。考虑到本文对市民身份的定义聚焦于户籍性质转换与跨区域迁移的核心群体,本文剔除了本县内农业户口等非典型市民化过渡群体,最终获得1173个有效观测值。

三是动态生命历程变量。本文选用代际差异与居留时长衡量样本的动态生命历程。其中,代际差异反映了个体在城市中的社会化过程,居留时长捕捉了在地生活时长带来的不同融入模式。考虑到我国城乡人口流动的历史背景,本文将“年龄”作为划分移民代际的代理变量:将40岁以上的样本划分为第一代移民,这类群体多为成年后进入城市务工;将40岁及以下的样本划分为第二代移民,这类群体多为随迁或在城市生活、成长。本文计算了样本在本地居住年限(受访年份-迁入年份),用以反映个体的居留时长。

(三)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模型如下:

$$Belonging_score_i = \beta_0 + \beta_1 Hukou_nonlocal_i + \beta_2 Controls_i + \epsilon_i \quad (1)$$

其中, $Belonging_score_i$ 代表个体*i*的归属感得分。 $Hukou_nonlocal_i$ 为核心自变量,个体*i*的户籍身份虚拟变量。 β_1 为主要观测系数,衡量了户籍身份的净效应。 $Controls$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向量,包括性别、民族、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受教育年限、自评健康状况、自评社会地位、家庭规模, β_2 为其对应的系数, ϵ_i 为随机误差项。

在机制检验中,本文构建以下模型:

$$M_i = a_0 + a_1 Hukou_nonlocal_i + a_2 X_i + \epsilon_i \quad (2)$$

$$Belonging_score_i = b_0 + b_1 Hukou_nonlocal_i + b_2 M_i + b_3 X_i + \epsilon_i \quad (3)$$

① McMillan D. W., Chavis D. M., “Sense of Community: A Definition and Theor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86, 14(1), pp. 6-23.

② Riger S., Lavrakas P. J., “Community Ties: Patterns of Attachment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Urban Neighborhood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81, 9(1), pp. 55-66.

其中, M_i 代表中介变量,主要指社会性隔离; X_i 为控制变量向量; a_0 、 b_0 为常数项; a_1 、 b_1 、 b_2 为主要待估计系数; a_2 、 b_3 为控制变量系数;其他变量的解释与公式(1)相同。

三、户籍身份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一)基准回归

为了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依次采用了普通最小二乘(OLS)、稳健标准误以及聚类标准误方法进行估计。表2结果表明,非本地户籍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这一结果充分验证了假说H1,即户籍身份对归属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基于前文理论分析,在相关政策推动下,非本地户籍居民的归属感仍显著低于本地户籍居民。这表明户籍身份的影响已非单纯的能否落户问题。在控制变量层面,婚姻状况、政治面貌、自评社会地位以及家庭规模等反映个体社会资本与经济地位的变量均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①。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OLS		稳健标准误		聚类标准误	
	(1)	(2)	(3)	(4)	(5)	(6)
户籍身份	-0.1143*** (-2.70)	-0.0959** (-2.28)	-0.1143*** (-2.69)	-0.0959** (-2.31)	-0.1143** (-2.39)	-0.0959** (-2.07)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观测值	2284	2284	2284	2284	2284	2284
R^2	0.003	0.035	0.003	0.035	0.003	0.035

注:括号内为t值;*** $p < 0.01$, ** $p < 0.05$, * $p < 0.1$;如无特殊说明,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②

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替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方式。在基准回归中,选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归属感指数。为检验结论是否对衡量方法敏感,分别采用等权重法和标准化法重新构建被解释变量,以排除指标构建方法的影响。第二,替换被解释变量指标。本文采用问卷中直接指向城市身份认同的题项,构建归属感虚拟变量进行回归。第三,缩尾处理。为排除极端异常值对估计结果的潜在干扰,本文对模型中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1%缩尾处理。第四,随机抽取样本。为验证结论是否依赖于特定样本结构,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全样本中随机抽取1500个观测值构成子样本,并进行回归。第五,Ordered Probit模型估计。为了将综合得分重新离散化后采用Ordered Probit,以检验结论对模型设定的敏感性,将被解释变量按分位数划分为五个等级,进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第六,倾向得分匹配PSM。为缓解样本自选择可能引致的选择性偏误,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中非本地户籍个体被设定为处理组,而本地户籍个体为控制组。通过半径及核匹配方法为其构建特征相似的控制组。结果表明,户籍身份对城市居民归属感的负向影响在所有稳健性检验中均保持显著。

(三)异质性分析^③

1. 不同收入水平。收入是衡量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核心指标,直接影响城市居民资源获取能力与社会网络构建。本文以样本个人年收入的中位数为界,将样本划分为高、低收入两组。结果表明,非本地户籍身份的负向影响效应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更为显著。在劳动力市场上,低收入群体更易

① 限于篇幅,基准回归控制变量结果未在文中呈现,如有兴趣可联系作者索取。

②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的完整回归结果未在文中呈现,如有兴趣可联系作者索取。

③ 限于篇幅,异质性分析的完整回归结果未在文中呈现,如有兴趣可联系作者索取。

陷入非正规就业,面临职业不稳定与社会保障缺失的困境,这种经济脆弱性削弱了低收入群体形成稳定生活预期的能力。此外,有限的支付能力也可能进一步导致空间边缘化现象,空间上的隔离可能极大地限制其获取信息、融入城市社会的机会。

2. 不同性别。本文进一步将样本进行了性别分组。结果表明,非本地户籍对男性和女性的归属感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但男性群体受到的负面冲击更大。这一结果说明,在传统的角色期望下,男性通常承担着在城市购房定居、支撑家庭发展的主要责任。城市住房购买、子女教育等核心资源高度绑定本地户籍,非本地户籍男性在面临这些制度壁垒时,往往承受着更为沉重的经济负担与相对剥夺感。

3. 住房产权。为进一步考察制度性资源对户籍身份影响的缓冲作用,本文按是否拥有房屋产权进行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对于无固定房产的城市居民群体来说,非本地户籍对归属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于有房产的群体来说,这一负向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对于城市居民而言,拥有房产能够显著缓冲户籍身份对归属感的负面影响,表明制度性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身份性劣势。对于无固定房产的非本地户籍居民而言,其归属感缺失更为突出。

4. 受教育年限。在我国,义务教育通常被视为纯粹的赋能过程。通常来讲,受教育年限越长,个体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能力就越强,这种基础人力资本的提升能直接转化为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强的适应力,因此归属感也随之上升。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个体对公平、尊重、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的期望就越高。此时,个体的需求可能更多转向尊重、发展机会与自我实现层面。进一步地,在对受教育年限进行分组异质性分析过程中,研究发现,在受教育年限为9—12年的群体中,户籍身份对其归属感的负向影响显著。他们能够产生更为强烈的城市融入期望和对公平待遇的渴望,而户籍制度的排斥则使其产生更大的心理落差。

5. 归属感水平。在基准回归中,本文考察了非本地户籍对归属感条件期望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揭示不同归属感分布区间上的异质性,本文进一步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异质性分析,分别考察了25%、50%和75%分位数上户籍身份的边际效应。结果表明,非本地户籍的负向系数呈现出随分位数提高而增大的趋势。具体而言,对低归属感组来说,户籍身份对归属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中归属感组、高归属感组来说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在低归属感群体中,个体可能面临多重剥夺,户籍制度的边际排斥效应已无太大作用空间;然而,在迈向高归属感群体的过程中,深度的社区参与与身份认同往往高度依赖本地制度资源的支撑。非本地户籍群体在获取这些资源时面临结构性壁垒,导致其难以跨越户籍门槛进入高归属感梯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户籍制度所衍生的制度壁垒,不仅整体拉低了外地人的归属感,更是阻碍其实现高水平社会融入的关键障碍。

(四)机制检验^①

基于前文分析,本文进一步从社会性隔离路径维度对户籍制度影响城市居民归属感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在社会网络的数量维度上,邻居数量对城市居民归属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非本地户籍的限制导致其邻居数量的降低。在加入该中介变量后,非本地户籍对归属感的直接负向影响依然显著。这一结果证实了社会性隔离路径的数量维度在户籍制度与归属感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假说H1a得以验证。非本地户籍的限制会减少邻里互动机会,限制可求助邻居的数量,进而间接削弱了其归属感。在社会网络的支持维度上,可求助邻居数量的提高对城市居民的归属感有显著正向影响,但非本地户籍显著减少了市民的可求助邻居数量,从而使得非本地户籍的直接影响变得不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即使城市居民能够通过各种方式与一定数量的邻居保持联系,但如果这些邻居无法提供实际支持,其归属感仍然难以建立。因此,要促进城市居民的心理融入,关键在于重建其社会支持网络,增强其在城市社会中的功能性嵌入。

^① 限于篇幅,机制检验的完整回归结果未在文中呈现,如有兴趣可联系作者索取。

四、户籍身份影响的拓展分析

(一)空间与身份梯度

为考察户籍身份影响的空间与身份双重梯度效应,本文进一步对户籍梯度效应进行分析,检验户籍身份的负面影响是否随流动距离增加而增强。表3显示,归属感均值随着流动距离的增加和外来身份属性的增强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跨县农业户口与外来非落户市民的归属感水平最低。如表4第(1)(2)列所示,相比本地户籍城市居民,跨县流动的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居民的归属感下降更为显著,其中跨县农业户口的归属感折损略高于跨县非农户口,假说H2得以验证。尚未完全消除的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会再次对农业户籍居民造成空间距离与户籍性质的双重剥夺。对于本县内跨乡镇流动,无论是从农村到城镇的农转非,还是在城镇之间流动的同级转移,户籍身份对其归属感的影响均未呈现显著差异。这一发现表明,在中国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以县级行政区划为边界的地缘壁垒,是比农业与非农业户口身份转变更重要的心理融入障碍。表4第(4)(5)列则进一步细化了居民身份类型,揭示了户籍影响的动态梯度效应。研究发现,外来非落户市民的归属感显著低于本地原市民,但当流动人口具备落户资格或成功落户后,其归属感便与本地原市民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表明,获得落户资格并实现身份转换是消除心理隔阂、实现社会融合的有效途径。结合第(6)列边际预测值,各类群体的归属感绝对水平呈现出明显的阶梯式分布。值得注意的是,实现本县内农转居的本地新市民群体表现出最高的归属感预测值,甚至超过了本地原市民,呈现出一定的新市民红利趋势,假说H3得以验证。这一现象可能源于个体对户口的珍视及其赋能效应,表明对于通过自身努力成功跨越制度门槛的个体而言,户籍转换不仅是其获取公共资源的象征,更是有力的社会承认。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户籍制度的心理排斥效应主要体现在跨县流动和未能落户两个层面。因此,解决外来流动人口的落户问题,不仅能有效提升归属感,增强城市认同感,更能激发新市民红利。

表3 不同户籍身份城市居民归属感均值

户籍类型	本地户籍	本县内农业户口	本县内非农户口	跨县农业户口	跨县非农户口
归属感均值	0.0475	0.0405	-0.0289	-0.2072	-0.1582
市民类型	本地原市民	本地新市民	外来落户市民	外来非落户市民	
归属感均值	0.0037	0.1509	-0.0929	-0.2072	

表4 户籍身份梯度效应

变量	总效应 (1)	梯度效应 (2)	预测值 (3)	变量	总效应 (4)	梯度效应 (5)	预测值 (6)
户籍梯度	-0.0447*** (-3.05)			市民身份	-0.0481* (-1.71)		
本地户籍		对照组	0.0369 (1.38)	本地原市民		对照组	0.0084 (0.22)
本县内 农业户口		-0.0221 (-0.28)	0.0149 (0.20)	本地新市民		0.1076 (1.62)	0.1159** (2.14)
本县内 非农户口		-0.0517 (-0.92)	-0.0148 (-0.30)	外来落户市民		-0.0557 (-0.61)	-0.0474 (-0.58)
跨县 农业户口		-0.1933** (-2.20)	-0.1564* (-1.87)	外来非落户市民		-0.1785* (-1.91)	-0.1701** (-2.02)
跨县 非农户口		-0.1665** (-2.56)	-0.1296** (-2.18)				
观测值	2284	2284		观测值	1173	1173	
R ²	0.036	0.054		R ²	0.032	0.046	

(二)代际差异与动态演变

为深入探究移民身份对归属感的动态影响,本文构建了包含移民代际、居留时长及其交互项等的回归模型,模拟户籍影响的动态演变过程。由表5可知,第一代移民与本地居民的归属感均值均为正值,而第二代移民的归属感均值则呈现为负值,与本地居民和第一代移民形成鲜明对比。表6第(1)列结果分析发现,第二代移民面临着严峻的归属感危机,其归属感水平显著低于本地居民和第一代移民。第(2)列引入居留时长变量后,结果发现居留时长对归属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关系数显著为正。然而,即便控制了居留时长,第二代移民的归属感劣势依然显著。为了检验这种同化效应在不同代际的差异,本文在第(3)列中进一步加入了居留时长与移民代际的交互项。检验结果发现,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不同群体在归属感随时间提升的速率上没有显著差异。结合前述研究可知,尽管居留时长的增加能普遍提升归属感,但第二代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归属感差异,无法仅凭居留时长的自然积累而被弥合,假说H4得以验证。这种不同代际城市居民之间参照群体的错位和身份认同根源的差异,导致融入过程的根本性分化。对于第二代移民而言,其参照群体变成了身边的本地同龄人。他们在同样的城市、学校长大,期望获得同等的权利、机会和社会认可。当面临户籍制度排斥时,他们相较于本地同龄人则构成剥夺性损失,产生更强的相对剥夺感,心理上的归属鸿沟也更加难以弥合。而对于第一代移民而言,其参照群体多为家乡同乡,其期望值相对较低。他们来城市的主要目标是改善经济状况,对于城市公共服务的缺位、社会权利的受限往往具备较高的容忍度与预期调整空间。这也意味着,当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有所提升时,更容易产生相对获得感。

综上所述,居留时长的增加能够提升所有群体的归属感,但它并不能有效弥合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固有的归属感鸿沟。只要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权利差异不改变,由此引发的相对劣势就无法通过单纯的时间积累得到自然消解,呈现出结构性与长期性的特征。

表5 不同移民代际城市居民归属感均值

代际分类	本地居民	第一代移民	第二代移民
归属感均值	0.0475	0.0879	-0.4540

表6 动态生命历程分析

变量	代际 (1)	居留时长 (2)	交互项 (3)
第一代移民	0.0070 (0.16)	0.0351 (0.78)	0.1407 (1.61)
第二代移民	-0.3499*** (-4.29)	-0.2899*** (-3.41)	-0.1957 (-1.52)
居留时长		0.0039*** (4.06)	0.0051*** (4.13)
第一代移民×居留时长			-0.0028 (-1.43)
第二代移民×居留时长			-0.0043 (-0.7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观测值	2284	2256	2256
R ²	0.061	0.068	0.069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3)数据,对城市居民的户籍身份与归属感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非本地户籍身份显著降低城市居民的归属感,且这一影响主要通过社会性隔离发挥作用。具体而言,户籍身份差异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社会交往与社会联结,进而削弱个体对城市的认同与心理归属,难以实现从“空间流动”向“心理融入”的根本转变。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显示,户籍身份的负向影响在特定脆弱群体,如低收入群体、男性、无固定房产群体、受教育年限为9—12年群体以及原本具有较高归属感的居民中更为突出。同时,本文发现户籍身份对归属感的影响呈现明显的空间、身份与代际差异,跨县农业户籍人口和第二代移民的归属感相对较低。此外,居留时长的增加能够在总体上促进归属感提升,但尚不足以弥合第二代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归属差距。

未来的政策推进,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 推进区域空间重塑,打破户籍维度的物理区隔。物理空间的隔离往往会加剧社会心理的边缘化,因此,提升空间可及性构成了改善城市居民归属感的必要前提。第一,打造社区共享生活圈。在进行城市更新与社区规划时,重视非本地户籍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需求,打破以本地居民为中心的传统服务供给惯性,通过完善便民商业、公共医疗、文化体育等基础建设,提升其服务可及性与平等感。第二,打破居住空间隔离。在保障性住房规划与公共空间设计中避免按户籍身份形成空间聚落,加大保障房供给,缓解其居住压力与经济不安全感。第三,强化城市公共空间的包容性。充分考量非本地户籍群体的精神文化与社交诉求,促进不同群体在日常生活的自然交汇,通过构建无歧视、平等化的城市空间网络,消除隐性排斥,真正实现物理空间的共享与交融,以高频率的空间互动实现不同群体心理层面的相互接纳。

2. 强化地方培育体系,弥补身份认同的情感边界。为促进城市居民实现从空间流动到心理融入的转变,需要进一步构建具有系统性、组织性特征的地方社会支持网络体系。第一,优化社区公共空间布局与功能,主动规划并改造能够促进偶然相遇和持续交往的非正式、低成本、高频率的互动场所。第二,建立新市民社区融入服务机构,针对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设计分类支持路径。如对于处于中学教育阶段、期望落差较大的群体,可通过精准的文化引导与社区参与,缓解其相对剥夺感;针对归属感水平较高的群体,应建立常态化的意见反馈与荣誉激励机制。第三,社区不仅是居住的场所,更应成为情感交汇与社会资本积累的重要交互平台。通过建立居民共同参与的社区议事组织,赋予居民在社区公共事务中的实质参与权,强化主人翁意识,切实提升个体的控制感与自我效能感,从而有效消解居民过客心态。

3. 深化空间融合,化解特殊群体的归属感危机。空间共享与社会交往的协同是缓解第二代移民归属感困境的重要基础。第二代移民面临着期望与制度排斥的强烈张力,为此,需推动以人为本发展理念在空间治理领域的实现,打破物理空间与制度空间的隐性壁垒,营造开放、包容的微观社会生态。第一,建立以社保缴纳年限、居住年限等可量化指标为核心的阶段式公共服务享有机制,逐步剥离户籍与福利分配的捆绑关系,优先推动跨县农业户籍人口与第二代移民在教育机会均等、城乡社保并轨等关键领域的制度改革,以实质性的权利均等化手段消解其结构性剥夺感。第二,教育系统不仅是知识传授的渠道,更是培育城市情感与文化认同的关键载体。因此,应当在教育系统中融入城市历史、多元文化融合等内容,帮助第二代移民群体建立对所生活城市的深厚情感和文化认同,完成城市认同的深层次内化,避免其在“回不去的故乡”和“融不进的他乡”之间产生身份撕裂。

From Spatial Mobility to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Hukou Status and Urban Residents' Sense of Belonging —Evidence from CGSS 2023

Hou Li¹ Zheng Zhengrong²

(1. North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P. R. China;

2.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College,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P. R. China)

Abstract: People-centered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s reflected not only in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e mobile population but also emphasizes their deep integration in terms of social interaction, identity recognition, and psychological belonging.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tatus, a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factor affecting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urban integration, may continuously shape urban residents' sense of belonging. The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2023 data from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index of urban residents' sense of belonging to systematically identify the impact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tatus and further examine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non-loc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s urban residents' sense of belonging, and this effect mainly operates through social isolation, meaning that differences i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can to some extent limit social interaction and social connections, thereby weakening individuals' identification with and psychological attachment to the cit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urther indicates tha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tatus is more pronounced among low-income groups, males, individuals without property ownership, individuals with 9-12 years of education, and residents who originally had a higher sense of belonging. Meanwhile, the impact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n the sense of belonging shows significant spatial, hukou identity, and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with cross-county agricultural household populations and second-generation migrants exhibiting relatively lower levels of belonging. An increase in duration of residence can generally promote greater sense of belonging, yet it is still insufficient to bridge the gap in belonging between second-generation migrants and local resident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requires moving beyond policy approaches that solely rely on relaxing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gulations, placing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mobile population in accessing public services, social interaction opportunities, and urban identity recognition. By strengthening social connections, enhancing the equity of public services, and enhancing urban inclusiveness, it is possible to facilitate the transition of the mobile population from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to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Keywords: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tatus; Urban residents; Sense of belonging; Spatial mobility

[责任编辑:陆 影]